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 及其政治话语分析*

朱传忠

内容提要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在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前史与成立时期、从边缘到中心时期、重建与分裂时期和调整与易变时期4个阶段。在意识形态方面,该党的政治话语是泛突厥主义、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糅合体,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土耳其民族主义话语的模糊性和不连贯性;就其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来看,可归入极右翼政党家族,1997年后该党有向中间政党移动的趋势;在具体活动方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青年组织理想之家曾开展暴力恐怖活动,还曾在海外建立支部,1987年重建后主要以合法形式参与土耳其选举政治,并多次获得议会席位和政府职位。然而,从历次选举结果看,民族行动党在土耳其选举政治中表现出高度易变性。

关键词 政党政治 土耳其 民族行动党

作者简介 朱传忠,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邮编710069)。

目前,正义与发展党(AKP)、共和人民党(CHP)、民族行动党(MHP)是土耳其三大主要政党。在2011年6月12日举行的土耳其第24届大国民议会选举中,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为13.01%,获得了53个议席。自

* 本文系西北大学“十二五”“211工程”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研究”(项目编号:YZZ12110)的阶段性成果。

其成立以来, 国外学者对民族行动党的研究就从未间断,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① 反观国内, 学者对土耳其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系统研究土耳其政党政治和探讨土耳其单个政党发展演变和政治主张的专著和论文尚不多见。本文在参考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梳理土耳其民族行动党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 分析该党的政治话语和主要政治活动。

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

作为土耳其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政党, 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主要发展阶段。

(一) 前史与成立时期 (1948 ~ 1969 年)

1945年11月1日, 伊诺努总统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 宣布允许持不同政见的同僚们组建政党, 以公开表示他们的信念和发布政治纲领。之后, 土耳其国内出现了多个政党。1946年1月, 民主党宣布成立。1948年7月, 民主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宣布成立民族党 (Millet Partisi), 并在1950年选举中获得了1个议席, 但该党于1953年7月8日被迫解散。1957年, 共和民族党和农民党 (KP) 宣布合并成立了共和农民民族党 (CKMP), 该党在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过几届政府。^② 在1961年选举中, 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了1.4%的选票。

自1960年起, 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 (Alparslan Türkeş) 开始逐步掌握

^① See Alev Çınar and Burak Ankan,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the Nation or the Nationalists?", *Turkish Studies*, Spring 2002, Vol. 3, Issue1, pp. 25 - 40. Sultan Tepe, "A Kemalist - Islamist Movement?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Turkish Studies*, Vol. 1, Issue2, Autumn2000, pp. 59 - 72. Bülent Aras and Gökhan Bacık,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and Turkish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4, Winter2000, pp. 48 - 64. E. Burak Arikan, "Turkish ultra - nationalist under review: a study of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8, No. 1, 2002, pp. 357 - 375. M. Hakan Yavuz, "The Politics of Fear: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MH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6, No. 2, Spring2002, pp. 200 - 221. Hugh Poulton, *Top Hat, Grey Wolf and Crescent: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7. Jacob M. Landau,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in Turke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7, No. 4, October1982, pp. 587 - 606. Ba? kan Filiz,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of Turkey",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2, No. 1, January2006, pp. 83 - 105. Güdeniz Katırcı,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 in Turkey: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after the 1999 Elections, *M. A. Thesis*, the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December2006.

^② Sabri Sayarı and Yılmaz Esmer, ed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Colorad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Appendix A, p. 186.

共和农民民族党领导权。1960年军事政变后，图尔克斯被迫流亡，期间，他提出了著名的“土耳其理想和文化联盟”（Turkey Ideal and Culture Union）计划，目标是控制教育部、宗教事务部、基金会管理局以及出版和广播事务，进而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施加绝对影响。^① 1963年2月23日，图尔克斯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5月，他和密友里法特·拜卡尔（Rıfat Baykal）、穆扎法尔·厄兹达（Muzaffer Özdağ）出版了小册子《几点真理》。在1964年11月18~20日的共和农民民族党大会上，图尔克斯的亲信约60人加入该党。按照图尔克斯的指示，“14人委员会”的重要人物敦达尔·塔希尔（Düdar Taşer）和穆扎法尔·厄兹达参加了1965年共和农民民族党的大会。^② 1965年3月31日，图尔克斯加入该党，竞争总书记职务。在1965年8月1日举行的党的特别大会上，原来的领导人被打败，退出该党；图尔克斯成为主席，厄兹达成为副书记。图尔克斯之所以选择共和农民民族党，是因为60年代的共和农民民族党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据统计，1965年，共和农民民族党在25个省建立了组织，1967年时达到了61个省。

在获得共和农民民族党的领导权后，图尔克斯决定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建立一个政党。1967年党的大会通过了新纲领，该纲领以“社群-民族主义”和“九点主张”为基础。图尔克斯被推举为巴沙布（突厥语“Başbuğ”，意为伟大领袖。）在这次大会上，图尔克斯放出豪言：“任何投身于事业的人，如果以后成了叛徒，就会被杀掉。”^③ 1969年土耳其农民民族党更名为民族行动党，建立了官僚科层式组织结构，图尔克斯的个人专权被制度化。由于该党在纲领和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该党在1969年选举中的表现，只获得了3.03%的选票。

综上所述，1965~1969年是共和农民民族党的转型期，意味着它与其前身的决裂。在这4年中，“突厥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元素融入了该党政治话语。查利克认为，随着图尔克斯当选该党领导人，共和农民民族党便成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④ 有学者甚至认为，1965~1969年间，

① Güdeniz Katırcı,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 in Turkey: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after the 1999 Elections”, M. A. Thesis, The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December 2006, pp. 75 - 76.

② Bülent Aras and Gökhan Bacık,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and Turkish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4, Winter 2000, pp. 48 - 64.

③ E. Burak Arıkan, “Turkish Ultra - nationalist under Review: A Study of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8, No. 1, 2002, pp. 357 - 375.

④ Güdeniz Katırcı, op. cit., p. 75.

“狂热的反共产主义”和“突厥主义”成为该党主张的核心。如在1965年选举宣传中，图尔克斯熟练运用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话语，强调“共产主义危险”、“宗派主义”和“教派主义”。同时，为了反对共产主义，1968年民族行动党成立了青年组织——理想之家（英语：“Idealist Hearths”，土耳其语：“Ülkü Ocakları”）。同时为团结党内反对派，图尔克斯甚至著书重新解释了1944年事件。然而，在这一时期，党内伊斯兰主义者与安纳托利亚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土耳其主义者之间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

（二）从边缘到中心时期（1969~1980年）^①

1969~1974年间，共和农民民族党在选举中依旧未见起色，大约仅获得3%左右的选票。1971~1973年则是该党最为被动的3年，此时民族行动党被排除出官方政治以外，这使它成为一个“不积极的”、“无创造性的”政治行为者。在1973年选举宣传活动中，虽然民族行动党强调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反共产主义、社会正义，但也只获得了3.4%的选票，有3人当选国会议员。

从1975年选举开始，共和农民民族党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它受邀连续参加了两届民族阵线政府。在第二届民族阵线政府中，民族行动党获得了副总理、贸易、卫生和社会事务、关税和垄断部的部长职务。在1977年选举中，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翻了一倍，为6.4%。可以说，整个70年代，民族行动党代表着“中心和边缘的有趣融合”。

然而，在获得议会代表资格的同时，民族行动党却蜕变成一个“准法西斯政党”，参与了反对左翼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暴力活动。1968年夏天，民族行动党下属的“灰狼组织”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附近成立了3个训练营。萨姆松和安纳托利亚等地也有类似的训练营。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训练营由图尔克斯的两位密友敦达尔·塔沙尔（Dündar Taşar）和里法特·拜卡尔亲自指挥。据估计，1970年这样的组织多达上千个。在1974年之前，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其他高等机构，目标是左翼革命组织，主要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或煽动全国范围的恐怖暴力。

（三）重建与分裂时期（1983~1997年）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军人再次干政，土耳其所有政党被解散，许多

^① 有的学者认为1965~1980年民族行动党是民族行动党从中心走向边缘的重要时期，但考虑到1971~1973年是民族行动党的较为困难的阶段，笔者还是采用1969~1980年说。

政党领袖被捕入狱；民族行动党的基础严重分裂，许多党员加入了其他政党（如祖国党）。“正是在这一时期，理想主义者第一次发现，他们不得不怀疑自己对土耳其国家的无条件支持。”^① 为了防止党的支持基础继续分裂，把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共同旗帜下，在获得图尔克斯允许的情况下，几名核心成员于1983年成立保守党（英语：“Conservative Party”；土耳其语：“Muhafazakar Parti”）。然而，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100号决定”，拒绝承认该党创始成员中的25人。由于军政府设置的障碍，保守党未能参加选举。^② 1985年，保守党大会决定更名为民族行动党（NWP）^③。1987年10月4日，图尔克斯获释出狱，加入民族行动党，并当选主席。之后，民族行动党参加了1987年选举，并获得了2.91%的选票。在1991年10月选举前，为了越过选举门槛，图尔克斯决定与埃尔巴坎的繁荣党组建选举联盟。在这一策略联盟中，该党候选人以繁荣党党员的名义参选，其中有19人顺利进入议会。

然而，这一时期的民族行动党党内已经存在着严重的派别之争，发生了一连串的分裂事件，分裂已是在所难免。1992年7月8日，该党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锡瓦斯议员穆赫辛·雅泽哲奥卢（Muhsin Yazıcıoğlu）和他的5位密友退党，宣布成立大团结党（BBP）。^④ 据悉，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是导致这次分裂的主要原因。在雅泽哲奥卢和他的同伴们看来，民族行动党偏离伊斯兰原则及其历史既定路线太远，被个人野心所掌控。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折射出党内斗争的激烈，同时也反映出保守边缘对世俗中心精英的胜利。^⑤ 7月11日，副主席勒扎·穆夫图奥卢（Rıza Müftüoğlu）辞职，说党已经变得“太激进”。7月23日，前副主席萨迪·苏

① E. Burak Arıkan, op. cit., p. 359.

② Bülent Aras and Gökhan Bacık,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and Turkish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4, Winter 2000, p. 50.

③ 党名略有不同，查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耳其语汉语词典后，发现两词的意思基本接近，为了保持原意，还是翻译为民族行动党，从词的原意看，现在的党名更适合于翻译为民族运动党。土耳其语“haraet”的意思为“运动”，为了保持习惯，文中还是译为民族行动党。

④ 穆赫辛·雅泽哲奥卢（1954-2009年），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大统一党的领导人，1954年出生于锡瓦斯的一个乡村。上世纪70年代曾是灰狼组织的成员，毕业于安卡拉大学生物药理学系，2009年3月25日死于飞机失事。他领导的大统一党曾在1995年选举中与祖国党组成选举联盟。其主要政治主张有：资本主义是侵蚀和分裂土耳其认同的力量。

⑤ Güdeniz Katırcı, op. cit., p. 101.

木尼朱奥卢 (Sadi Somuncuoğlu) 在考扎特佩宣布成立新党。^① 1993 年 3 月, 该党的极右翼 13 人分裂, 其中 7 人加入了大团结党; 两人加入了阿依库特·埃迪巴里 (Aykut Edibali) 领导的民族党。1994 年 10 月 3 日, 伊斯坦布尔议员涂尼杰·陶斯凯 (Tunçe Toskay) 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成立了倡议团结党 (Call for Unity Party), 然而几天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②

总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民族行动党经历了重大变革, 变成了一个族群的、世俗的土耳其人政党。^③ 在分析该党的发展演变中不能忽视苏联解体、中亚地区突厥国家的独立和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出现在民族行动党的世俗的族群的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四) 调整与易变时期 (1997 年以来)

1997 年图尔克斯的逝世对该党来说, 是一个新的困难和挑战。图尔克斯去世后, 党内围绕党主席一职展开了激烈竞争, 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1997 年 5 月 18 ~ 19 日, 党的大会召开, 8 名候选人竞争党主席一职, 这其中包括图尔克斯的儿子图格鲁尔·图尔克斯。在首轮选举后, 有 6 名候选人支持德乌莱特·巴赫切利 (Devlet Bahçeli)。^④ 图格鲁尔·图尔克斯意识到他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策划了一起暴乱, 激进的理想主义之家成员闯入大会执行席。接下来的发展很像枪战片, 混乱遍布整个大厅, 甚至还听到了枪声。结果, 大会被迫推迟, 民族行动党的形象严重受损。^⑤ 是年 11 月, 党的大会选举德乌莱特·巴赫切利为党主席, 开启了民族行动党的新时代。

巴赫切利上台后开始着手调整党的战略和政策。为了同时吸引乡村选民和城市选民, 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1) 在组织方面, 拒绝接受党中央指示的支部立即被解散, 建立党校以及研究发展部用于恢复党中央对边缘的支配

① 在军事政变期间, 民族行动党把财产转移给图尔克斯个人以防更大损失。后来法庭判决财产属于该党所有并予以没收。然而, 当旧政党可以开展活动时, 图尔克斯得以重新控制了这些财产。

② Hugh Poulton, op. cit., p. 142.

③ M. Hakan Yavuz, "The Politics of Fear: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MH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6, No. 2, Spring 2002, p. 207.

④ 德乌莱特·巴赫切利, 1948 年出生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尼亚省, 是民族行动党的现任领导人, 毕业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温床——加齐大学, 1987 年以前一直是该校副教授。1997 年当选党主席后, 强调宽容。在 1999 ~ 2002 年埃杰维特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理, 自 2007 年 7 月 22 日以来, 任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

⑤ E. Burak Arıkan, op. cit., pp. 370 - 371.

地位。同时，党校和研究发展部用于向党员传授新的世界观和政治技能。^① (2) 在意识形态方面，力主温和，强调各种主义之间的平衡。经过一系列调整后，该党的乡村支持者稳步增加，新政策还帮助巴赫切利进一步巩固了党内权力。巴赫切利的专权得以建立，意识形态标准得以强化，与乡村选民的联系得以加强。(3) 在政党形象和领袖形象塑造方面，民族行动党提出了“新政党、新领袖”的口号。在所谓的1997年“二·二八”进程后，民族行动党采取关注全国性问题如腐败和恐怖主义，不卷入国内非建设性冲突的战略。

此外，民族行动党的形象得以成功转变，与新领袖的性格和主张紧密相关。与图尔克斯的激进形象不同，巴赫切利是一位学者，而且，两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有所不同。图尔克斯强调“忠于意识形态”，巴赫切利关注“忠于土耳其”，强调“第一，我的国家；而后我的政党；再然后我自己”。

1999年大选结果表明，民族行动党的政策调整非常成功。民族行动党成功地跨过了选举门槛，获得了18%的支持率，拥有129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民族行动党之所以能够在1999年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除自身政策调整外，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1997年后的土耳其政治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二八”进程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言：“在1980年军事政变后，没有事情像199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那样对土耳其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性。在这次关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军队再次强调它对政治生活的超越。”^② 因此，倡导与国家保持一致的民族行动党赢得了选民的信任与支持。二是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泛起的影响。1984年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在土耳其国内蔓延，这主要是由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恐怖活动所致。在阵亡士兵的葬礼上，亲属和朋友们高唱民族主义歌曲，反复呼喊民族主义口号——“我们在这，库尔德工人党在哪？”或“没人能够分裂土耳其，摧毁我们的旗帜。”民族主义歌曲遍布土耳其电视和广播，像“我们的祖国土耳其”、“我要为祖国牺牲”、“爱他或者离开他”都是当时土耳其名列前茅的歌曲。三是选举策略得当。民族行动党把自己标榜为中右政党，在选举活动避免使用激进话语，同时加强与选民的交流与沟通。民族行动党的时任总书记考莱·阿依丁(Koray Aydin)说：“我们进行面对面

^① E. Burak Arıkan, op. cit., pp. 360-361.

^② Bülent Aras and Gökhan Başk, op. cit., p. 51.

的交流，我们的选举活动增加了人性维度。”^①

但是民族行动党很快就耗尽了土耳其选民的政治信任，联合政府的部长们先后陷入了腐败丑闻。先是通讯部长埃尼斯·厄克苏兹（Enis Öksüz）在土耳其电信公司私有化问题上出了差错。接着建设部长考莱·阿依丁被迫辞职，因为他在处理大地震问题时成了“腐败部长”。可以说，联合政府不仅埋葬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行动党，而且削弱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②

为重塑政党形象，2000年民族行动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强调民主和人权。2002年11月，土耳其第22届大国民议会选举正式举行，新组建的正义与发展党异军突起，成为土耳其执政党。因在联合政府中的糟糕表现，民族行动党仅获得了8.34%的支持率，未能越过10%的选举门槛。而在2007年土耳其第23届大国民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的三大政党。2009年，党的大会通过了新纲领，党的中右特征日渐明显。^③

自2002年11月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民族行动党一直实行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加入欧盟问题上，与正义与发展党积极寻求加入欧盟不同，民族行动党成为土耳其国内疑欧主义政治力量的代言人。^④针对2005年正发党政府为入盟谈判正式开启庆功，该党进行了严厉批评，声称“在土欧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土耳其一直经历了由欧盟带来的失望和歧视。与欧盟的关系脱离了尊重和好意。欧盟努力使土耳其成为一个联盟内的卫星国，而正发党却正毫不怀疑地进行这个游戏。一些国内敏感的议题不能操于外国人如欧盟之手。”^⑤2006年，在8个领域的谈判被叫停之后，该党领导人巴赫切利提出欧盟计划对土耳其实际上是一个骗人的毁灭计划。2007年大选中，该党成为主要政党中反对欧盟的声音最响亮。在2008年的政党议程中，它指出那些对土耳其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如民族文化、领土完整、国家的独特结构应该被

①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12.

②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19.

③ 民族行动党2009年党纲（土文版），see http://www.mhp.org.tr/usr_img/_mhp2007/kita-plar/mhp_parti_programi_2009_opt.pdf, 2012-08-12.

④ 李明明：《拒绝欧洲化？——土耳其疑欧主义的兴起》，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4期，第73~79页。

⑤ 转引自李明明：前引文，第76页。

尊重。未来和欧盟的关系主要标准表现为对这些价值的尊重。^①

第二，在2011年大选的选举宣传中，该党的反正义与发展党（anti-AKP）政策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批评正义与发展党导致了土耳其团结的蜕化。在锡瓦斯集会上，巴哈切利指责正义与发展党成为了“族群基础上的分离主义者”，他还指责正义与发展党容忍库尔德分离主义，某种程度上成为库尔德工人党的共犯。其二，指责正义与发展党弱化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或突厥特征。该党认为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正在毁掉土耳其民族的传统和民族特征。其三，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腐败，特别是通过它的政治庇护体制制造了新的富人阶层。^② 现任总理埃尔多安则指责民族行动党未能倾听保守民众的诉求，指责民族行动党与凯末尔主义的支持者合作，公开向民族主义选民献媚，指责“民族行动党不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③

第三，指责正义与发展党要为性录像带丑闻事件负责。性丑闻录像带在选举之前泄露，导致该党最高执委会的10名成员被迫辞职。民族行动党议员阿里·陶莱克（Ali Torlak）指责正义与发展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声称，“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的唯一目的就是瓦解和消灭唯一能阻止它的政党——民族行动党”。可以说，性录像带丑闻加剧了两党之间的对抗和竞争。土耳其国内学者认为，2011年大选表明，该党已经沦为土耳其的边缘政党，如果不能及时作出意识形态和选举策略的改变，提出明确的政党认同，该党将面临着内部分裂甚至瓦解的危险。^④

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史似乎验证了著名的土耳其政治研究专家额尔古纳·奥兹巴丹的判断，“民族行动党在70年代极左和极右翼团体的暴力冲突中扮演了非常极端的角色。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行动党似乎越来越趋向中间主义。”^⑤ 但1999年大选后，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亦呈现出政治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和边缘化的趋势。

① 李明明：前引文，第76~77页。

② Gökhan Bacak,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in the 2011 Elections: The Limits of Oscillating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4, 2011, pp. 178-179.

③ Gökhan Bacak, *op. cit.*, p. 180.

④ 其实该党的内部分裂已经开始。巴哈切利的首席顾问乌达特·博尔金（Vedat Bilgin）已经辞职，成为亲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家。

⑤ 额尔古纳·奥兹巴丹：《土耳其政党制度衰落》，载【美国】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主编；徐琳译：《政党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话语分析

一般认为，九点主张（或称九盏灯主义）是民族行动党政治话语的集中体现。1963年图尔克斯和他的密友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几点真理》，论述了九点主张。九点主张的基本原则是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社群主义、乐观主义、乡土主义、解放主义与性格建构、现代化与民众主义和工业主义。^①然而，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民族行动党的意识形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呈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土耳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行动党经常调整意识形态侧重点，采取政治模糊主义（Political Obscurantism）和工具理性态度，在几种主张中间来回摇摆。

第一，民族主义话语是民族行动党政治话语的最基本原则，但根据土耳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侧重。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等是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遗产，民族行动党的民族主义话语自然受到了这些丰厚思想遗产的影响。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该党经常更换意识形态侧重点，试图调和各种主义之间的关系。如1960年军事政变时，该党领导人支持军人干政，是十足的凯末尔主义者；而在上世纪70年代，它热衷于“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理论（TIS），强调宗教因素对民族主义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由于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行动党再次转向了土耳其主义。换言之，它并不试图规范土耳其民族主义中的历史非理性（Historical Irrationalities）。其民族主义看上去既是公民的、种族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同时也是宗教的、世俗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成了该党利用的工具。正如有学者所言：“思想被用作唤起热情而不是理性的口号和信条，它们不是冷静和理性演说的要素，而是煽动和鼓惑轻信而缺乏批判能力的听众的一种手段。”^②

第二，民族行动党的泛突厥主义话语兼有政治泛突厥主义和文化泛突厥

^① “九点主张”的土耳其语表述如下：民族主义（milliyetçilik）、理想主义（ülkücülük）、道德（ahlakçılık）、社会思想（toplumculuk）、科学主义（ilimcilik）、自由主义（hürriyetçilik）、农民（乡村）主义（köycülük）、发展和民众主义（gelişimcilik ve halkçılık）、工业化和技术（endüstricilik ve teknikçilik）。

^② [美国] 非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主义的双重特征。自民族行动党成立以来，泛突厥主义在该党纲领和政治话语中就占居重要位置。著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专家胡戈·鲍尔顿（Hugh Poulton）认为，“为吸引选民，在把种族-图兰主义从党的官方主张中剔除的同时，它（图兰主义）依然是永远的丝线。”^①同时，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几千名极端右翼志愿者在纳卡地区与阿塞拜疆武装一起战斗。^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族行动党的民族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坚持统一国家，同时领导土耳其和国外突厥民族的事业。”^③图尔克斯本人亦声称：“我们的民族主义意味着突厥主义（Türkçülük）。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意味着符合所有的土耳其精神领域和传统，能够为所有突厥人和突厥民族在每一件事上提供帮助。”^④民族行动党的意识形态也曾作出过某种程度的调整，在成为国内主要的右翼政治组织之后，该党很少强调泛突厥主义。比如民族行动党的1988年纲领中仅两次提及“国外突厥人”，仅一次提及“突厥世界”。^⑤厄兹达也承认，完全的政治泛突厥主义从未是党纲的一部分，但总是文化的一部分。厄兹达否认了任何种族主义指控，声称历史上土耳其从未是种族主义的。图尔克斯同样也否认种族主义指控，他否认土耳其历史上有任何种族屠杀的证据，提及奥斯曼帝国给予犹太人的热情接待，他指出：“因为历史的辉煌，这不可能在土耳其社会出现，任何像灭绝民族这样的灭绝观念属于不同的民族或宗教”。民族行动党1988年纲领指出：“因为它是一种文化运动，土耳其民族主义拒绝种族主义”。^⑥为了应对可能的批评，图尔克斯强调其主张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别：“国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反民主基础上的，在实验室中创立。而九点主张的追随者相信土耳其社群主义、一个从社会心理层面界定对古老传统的尊重，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民族行动党认为，这一主张是人民忠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唯一指导。^⑦

第三，民族行动党的主张与官方的凯末尔主义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明显

① Hugh Poulton, *op. cit.*, p. 153.

② *Ibid.*, p. 152.

③ *Ibid.*, p. 155.

④ *Ibid.*, p. 146.

⑤ 这在党纲第六条和第四十一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即“实现突厥世界的语言统一”和“发展与突厥世界的关系”。

⑥ Hugh Poulton, *op. cit.*, p. 148.

⑦ E. Burak Arıkan, *op. cit.*, p. 368.

区别，且在许多现实问题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官方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是纯粹的世俗民族主义，民族行动党的民族主义则与伊斯兰教价值观密切相关。如在国家主义问题上，民族行动党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对该党来说，土耳其公民有义务为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做出牺牲，必须高于个人利益。此外，民族行动党不是真诚地接受新自由主义，这一点与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极右翼政党有着很大不同。

在许多现实问题上，民族行动党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以现实经济问题为例，民族行动党批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认为自由市场为个人主义创造了机会，腐蚀了家族价值观，但并未提出明确的经济主张。再以头巾问题为例，民族行动党曾承诺解决妇女头巾问题，但该党女议员在进入议会大厦前摘掉头巾的举动，使选民失去了对该党的信任。

第四，民族行动党对伊斯兰教采取工具理性态度。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文化和认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属于“深义文化”的内容，因此对土耳其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凯末尔主义者成功地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话语之外，暂时解决了宗教与民族主义的悖论。但多党制开启后，伊斯兰教的政治化进程再次加速，成为影响土耳其政治发展的重要传统社会文化因素。上世纪60年代，土耳其国内思想家提出模糊的安纳托利亚伊斯兰教（Anatolian Islam）概念，认为宗教和民族主义是可以调和的，是解决伊斯兰教政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的历史途径。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解释，调和了伊斯兰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把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限制在私人领域和道德领域。如1972年，图尔克斯加入“伊斯兰原则”，强调伊斯兰教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图尔克斯声称：“离开宗教民族不能生存。每个民族都信仰宗教。……‘九点主张’的基础和源泉是这些：土耳其意识、伊斯兰信仰、伊斯兰道德和美德。”^①在一次对“青年灰狼组织”的演讲中，图尔克斯带着圣战口吻说：“安拉与我们同在，因为她赞同真理；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完美的。”^②1979年，一位民族行动党的前领导人对狱中的该党激进分子讲话时说：“古兰经学习班是必修课。必须学习伊斯兰课程、祈祷等。监狱是石质的马德拉萨。”^③如此看来，伊斯兰教被该党建构

① Hugh Poulton, op. cit., p. 157.

② Ibid.

③ Ibid.

成了土耳其性 (Turkiness) 的一部分。民族行动党 1988 年党纲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党纲提到, “人类是由至大的安拉创造的神圣生物, 3 000 年的土耳其历史, 有 1 400 年是伊斯兰的。”^① 在 1992 年分裂后, 民族行动党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更加明确了, 正式把伊斯兰教定义为是“温和的、世俗的国家主义的基础”。^② 但到了 90 年代后期, 该党又举起了“反伊斯兰主义”大旗。

第五, 民族行动党对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表现出前后不一的复杂特征。一般认为, 民族行动党强烈地反对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 主张对库尔德工人党 (PKK) 及其恐怖活动采取严厉措施。然而, 这种主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如, 1992 年 7 月, 在与人民劳动党 (HEP) 和自由平等党 (ÖZDEP) 的政治家会面后, 图尔克斯声称民族行动党现在把库尔德人当兄弟, 即使他们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 他声称正在寻求不流血的解决办法。他说: “我姐姐嫁给了库尔德人, 我怎么能成为我外甥的敌人呢? 该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孩子。”^③ 他甚至反对取缔人民劳动党, 认为应准许所有政治主张的存在, 呼吁该党不要卷入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冲突。1992 年 2 月 13 日, 在一次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协会的会议上, 图尔克斯指大多数库尔德人实际上是突厥人, 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是希腊在亚美尼亚和西方支持下分裂安纳托利亚的阴谋。图尔克斯声称: “我们都是兄弟, 我们来自共同的祖先。恐怖分子试图强迫我们东南部的公民逃亡别的地区, 以实现他们的大亚美尼亚梦想。”^④ 但是在 1994 年 3 月, 他又指责库尔德工人党与反对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组织——亚美尼亚解放秘密自由军合作。

第六, 民族行动党主张认清国家的“敌人和朋友”, 实行敌友政治, 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对手 (主义) 作为敌人。敌友政治是民族行动党政治话语和选举宣传的惯用策略和手段。如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共产主义革命者、80 年代是库尔德工人党、90 年代是伊斯兰主义者和库尔德工人党、新世纪则是正义与发展党。诚如土耳其政治研究专家哈坎·雅乌兹所言: “民族行动党总是通过反对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以制造‘恐惧’。”^⑤

① Hugh Poulton, op. cit., p. 158.

② Güdeniz Katreç, op. cit., p. 106.

③ Hugh Poulton, op. cit., p. 154.

④ Ibid., p. 154.

⑤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06.

结 论

首先，通过分析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史，我们大致勾勒出其发展演变和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历程。政治学家认为，在政党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和解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不难看出，民族行动党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丧失合法性的危险。比如，民族行动党在获得议会代表资格和政府职位后，也挥霍着各种资源，陷入了腐败丑闻，一定程度上也丧失了合法性。

其次，通过分析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话语，不难窥探该党的政治话语呈现出高度的“工具理性”特征。自成立以来，民族行动党的意识形态选择始终游走于伊斯兰教、国家主义、世俗主义、种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之间。民族行动党试图同时代表保守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世俗主义者选民，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意识形态重构。如此，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民族行动党不得不借助于“工具理性”，选择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利的意识形态。

再次，通过分析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和政治话语，可以看到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义之争”和认同政治。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宗教文化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进程中。正如哈坎·雅乌兹所言：“认同政治最终圈定了政党的框架。由于认同基础的政治体系倾向于把各种形式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分野包含在认同范畴内，政治争论变得被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逊尼派与阿莱维派、库尔德人和突厥人之间的话题所主导。”^①同时，不断寻求认同的过程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土耳其意识形态认同的真空，导致了政党政治出现高度碎化和易变的格局。

最后，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样板，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但透过民族行动党的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出，所谓的“土耳其样板”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土耳其政治精英寻求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历程和努力似乎还远未结束，土耳其真正的巩固的民主是否已经到来还存有疑问。以土耳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和社

^①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02.

会两极化现象”为例，上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土耳其国内均出现了社会文化的极化现象，70 年代呈现左右极化，90 年代则为族群宗教极化。而且学者在分析 2011 年土耳其大选时亦指出，2002 ~ 2011 年间的土耳其政党政治亦呈现出中左翼和中右翼两极分化的特征。^① 诚如哈坎·雅乌兹所提到的：“土耳其总是缺乏一个共同的有吸引力的能够应对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契约。”^②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in Turkey

Zhu Chuanzhong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nationalist party in Turkey,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urkey's politics. Its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four major periods, namely, the period of pre-history and establishment, of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of crisis and rift, and of adaptation and volatility. Ideologically, its political discourses are the hybrid of Islamism, Ottomanism and pan-Turkism, which, to some degree, reflect the inconsistency and ambiguity of the nationalism in Turkey. As far as the position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s concerned,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falls under the extreme right wing parties family. The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took part in the violent activities in early stage; however, it participated in electoral politics wholly.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2007, this party and AKP, CHP become the three main parties of Turkey. But, from the result of every election, its performance represents the very high level of the electoral volatility.

Key Words: Party Politics; Turkey;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Gökhan Baçk, "The 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in the 2011 Elections: The Limits of Oscillating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4, 2011, pp. 171 - 187.

^②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20.